

地域抗战文学的国际传播策略个案研究

——以桂林抗战文学为例

于桂彬, 吕佳静, 吴雨桃, 许巧, 宁心怡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DOI:10.61369/HASS.2026030029

摘 要 : 桂林抗战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 承载着“文化抗战”的丰富历史记忆与精神价值。然而, 在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中, 桂林抗战文学的对外影响力远不及桂林的自然山水, 其传播困境折射出地域性红色文化资源“走出去”的普遍难题。本文以桂林抗战文学为案例, 系统梳理其核心资源与跨文化价值, 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接受语境四个维度剖析现实困境, 进而提出五方面的策略路径: 叙事重构、沉浸式体验、微媒介与跨媒介传播、文化适配与翻译策略、多元主体协同。研究认为, 地域抗战文学的国际传播应超越传统的“作品译介”模式, 走向“体验激活 + 价值共鸣”的复合路径, 使地方性历史记忆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全球文化体验。

关 键 词 : 桂林抗战文学; 国际传播; 沉浸式体验; 新大众文艺; 文化适配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Strategies of Regional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Taking Guilin's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Yu Guibin, Lv Jiajing, Wu Yutao, Xu Qiao, Ning Xiny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 : As a unique region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uilin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carries rich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spiritual value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However,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Guilin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falls far short of Guilin's natural landscapes, and its dissemination challenges reflect the widespread difficulties in promoting region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globally. Taking Guilin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core resources and cross-cultural values, analyzes practical dilemmas from four dimensions—communication subjects, content, channels, and reception contexts—and proposes five strategic approache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s, micro-media and cross-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should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work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model and adopt a composite path of "experience activation + value resonance," transforming local historical memories into participatory and empathetic global cultural experiences.

Keywords : Guilin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al adaptation

引言

在文化强国战略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中国文学“走出去”已从单纯的语言翻译上升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维度。抗战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极具历史厚重感与精神感召力的组成部分, 其国际传播不仅关乎文学文本的跨文化流动, 更承载着讲述中国人民抗战故事、展现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使命。然而, 长期以来, 抗战文学的国际传播主要聚焦于宏观的国家叙事或少数经典作家作品, 对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抗战文学关注或有欠缺。

作者简介:

于桂彬,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 吕佳静,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 吴雨桃,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 许巧,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 宁心怡,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

吴福辉指出，桂林“成了南北文化流动的理想集散地”^[1]，其文学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而且促进了广西本土文学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型^[2]。本文以桂林抗战文学为案例，首先梳理其核心资源与跨文化价值，进而考究当前传播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叙事重构、沉浸体验、微媒介传播、文化适配、主体协同五个维度提出策略构想，以期为地域性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参考。

一、桂林抗战文学的资源构成与跨文化价值

（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桂林抗战文学在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中产生。“岩洞教育”——日军空袭频繁，学校无法正常上课，师生便躲进七星岩等天然岩洞继续教学，陶行知曾大力推广这一模式。“西南剧展”——1944年，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发起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三十多个剧团、近千名戏剧工作者汇聚桂林，演出持续三个月。抗战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文化现象的启发，可以转化为可体验、可场景化、可转化为沉浸式项目的文化资源。

（二）作家群与作品

根据现有研究，抗战时期曾出现三次作家集结桂林的高峰。第一次高峰以广西师专为中心，沈起予、陈望道、夏征农、杨潮等左翼作家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陆续到桂，系统化地带来了新文学理念^[2]。第二次高峰出现在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之后，巴金、艾青、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大批文化人撤退至桂林，桂林此时成为西南抗战文化的核心枢纽^[2]。第三次高峰则是1942年香港沦陷后，茅盾、胡风、端木蕻良等辗转抵达桂林，将桂林抗战文化推向了高潮^[2]。

这些旅桂作家在桂林期间创作了大量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在诗歌领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吹号者》《火把》成为战时诗歌的经典，其中《我爱这土地》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深沉咏叹，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熔铸一体。在小说领域，王鲁彦的《陈老奶》塑造了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形象，以雕刻般凝重的笔触写出了战争对人性的伤害与民族的韧性；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则被夏志清、杨义等学者高度评价为“令人神往的艺术精品”^[2]。在散文与杂文领域，巴金的《桂林的受难》以第一人称实录了桂林大轰炸的惨烈景象，至今仍具思想冲击力。

（三）跨文化价值的潜力

桂林抗战文学的国际传播潜力巨大，蕴含着超越国界与时代的跨文化价值。

一方面，它反映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的文化共同体。桂林不仅是国内文化人的避难所，也是国际友人援华的重要节点——胡志明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以“平山”为笔名连续发表了《越南人民与中国报纸》《安南歌谣与中国抗战》等多篇文章，明确提出“救中国就是救自己”的观点^[3]；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由重庆抵达桂林，到《救亡日报》社、文化供应社及《国民公论》社参观，并陆续对外发表了《鲁迅是一把剑》《中华战歌》等文章，呼吁民众抗战到底^[3]。这些史实使桂林抗战文学具有跨国叙事的基因。

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个体命运与道德抉择”的情感锚点。王鲁彦笔下的陈老奶、端木蕻良笔下的少年兰桂、艾青诗歌中那个“眼里常含泪水”的抒情主人公，都是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情感打动读者。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人文主题，有助于桂林抗战文学跨越文化壁垒。

二、桂林抗战文学国际传播的困境

多元参与不足，当前桂林抗战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政府文旅部门和事业单位，缺乏社会化的传播力量。自媒体博主、留学生群体等“新大众”未被有效动员。但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国际传播正经历从专业机构主导向多元主体共创的范式变革，“曾经的受众转变成能动的‘产消者’，广泛参与内容生产、传播与再生产”^[4]。桂林抗战文学尚未利用这一变革红利。

宏大叙事大过个体叙事，现有对外宣传材料缺少具体的人物、故事和情感细节。跨文化传播研究表明，国际受众更易于接受“小切口”表现“大主题”的叙事方式，即以具体的英雄人物、生动的革命故事、真实的生活场景为切入点^[5]。桂林抗战文学中并不缺少这样的素材，但尚未被系统性地提炼和转化为对外传播内容。

传统媒介为主、数字平台缺位。目前的主要传播渠道是纸质出版物、纪念馆展陈和少数文化展览，而对TikTok、YouTube等国际主流数字平台的利用较少。年轻一代的国际受众习惯于通过短视频、播客、流媒体获取信息，传统传播方式难以触达这一群体。

文化认知隔阂阻碍。研究表明，中国文学外译面临的核心难题是文化语境难以等值转化。“诸如‘礼’‘孝’‘气韵’‘缘分’等概念在西方语言体系中往往缺乏对等表达”^[6]。桂林抗战文学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例如，“岩洞教育”若直译为“cave education”，可能被误解为探险活动。此外，抗战文学中强烈的民族情感表达，如果不经适当的文化转译，容易被视为“宣传”而非“文学”。文化认知隔阂的存在，使得作品的感染力在跨语际传播中大打折扣。

三、桂林抗战文学国际传播的策略

（一）从民族悲情到人类共情的叙事重构

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传播者输出多少信息，而取决于受众是否产生情感共鸣。因此，桂林抗战文学的对外叙事需要进行一次“价值升维”——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将民族抗争的叙事框架拓展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叙事框架。

提炼普世主题。将“反法西斯、保家卫国”这一宏大主题细化为若干个可供跨文化共情的小主题：战火中的母爱（王鲁彦《陈老奶》）、青春与失落（端木蕻良《初吻》）、文明在极端困境下的韧性（岩洞教育）。这些小主题不需要受众具备深厚的历史背景知识，却能通过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引发共鸣。

从“大人物”转向“小人物”。在对外传播中，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命运，比抽象的文化符号更具穿透力。与其反复讲述外国友人不了解文学巨匠的生平，不如讲述一个普通的桂林母亲、一个在岩洞里教书的年轻教师、一个从东北流亡到桂的诗人。

打造简洁可记的叙事IP。可将“桂林文化城”凝练为一个具有画面感的概念，例如“Where Bombs Fell and Poems Rose”（炸弹落下之处，诗歌升起之地），配合历史影像进行传播。

（二）让历史场景“可进入”的沉浸体验

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应改变传统参观模式，借助情景再现、角色扮演、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国外参观者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5]。可选择七星岩地质条件较好的岩洞，复原战时课堂场景，开发“岩洞课堂”沉浸式项目。参与者坐在岩洞中，听一段关于“岩洞教育”的英文讲解，参与模拟的“防空警报一进洞上课”互动环节，还可结合AR技术让虚拟历史人物“出现”在岩洞中对话。这类沉浸式项目不仅能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记忆度，还能形成二次传播的素材。

（三）以微媒介与跨媒介传播降低文化门槛

在注意力被削弱的时代，长篇大论的学术著作和展览难以触达大众。须将桂林抗战文学的内容“碎片化”“轻量化”，投放到年轻人聚集的数字平台。

可制作系列短视频在TikTok和YouTube上发布，每期60秒以内，聚焦一个“小故事”：“岩洞里的小学：中国孩子如何在轰炸中上课”“一位美国飞虎队员眼中的桂林文化人”。视频采用历史照片、动画、实拍混剪，配以英文旁白和字幕。此外，可发起用户生成内容挑战，在TikTok上发起主题挑战，邀请全球用户用母语朗读艾青的诗句，配上个人创作画面，优秀作品给予相应奖励。这种做法契合了新大众文艺“多元主体共创”的逻辑^{[4][78]}，一定程度上让国际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

（四）从“硬转译”到“再创造”的文化适配与翻译策略

文学翻译不是字对字的转换，而是文化意义的再组合。译者需对“文化语义差额”保持敏感，在必要时采取归化、意译甚至改写

策略，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产生与原作相近的接受效果^[6]。

笔者认为，建立中外合作翻译机制是前期必要条件。由熟悉桂林抗战史的中国学者提供准确的文本解读和文化背景，母语为英语的译者进行文学化转写，双方反复讨论，在忠实原文与符合目标语阅读习惯之间寻找平衡。例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译为“Why are my eyes always filled with tears? / Because I love this land with all my heart”——“with all my heart”比直译“deeply”更符合英语诗歌的语感，同时保留了情感的浓度。

（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复合传播网络

国际传播不能只靠政府和事业单位，需要形成“官方—民间—市场”协同发力的格局。

在民间力量方面，可邀请在桂林生活的外国博主、留学生参与体验项目，让他们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分享感受。外国人的“他者视角”往往比官方宣传更具说服力。在市场层面，可开发“轻量级”国际文创产品，如印有《救亡日报》版式的笔记本、艾青诗句书签、岩洞教室立体拼图、战时桂林地图丝巾等，作为国际交流礼品或景区纪念品销售。这些产品以“可携带”的方式让文化进入外国游客的日常生活，实现传播的常态化。

四、结语

桂林抗战文学既承载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集体记忆，又蕴含着超越国界的人类共通情感。在文旅深度融合与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让这段“文化抗战”的历史走向世界，不仅是提升桂林国际旅游城市文化内涵的需要，也是丰富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内容体系的题中之义。

本文以桂林抗战文学为例，分析了其资源构成与跨文化价值，诊断了当前传播在主体、内容、渠道、接受四个维度上面临的困境，并从叙事重构、沉浸体验、微媒介传播、文化适配、主体协同五个方面提出了策略构想。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策略并非孤立的技术操作，而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叙事重构提供内容灵魂，沉浸体验创造场景记忆，微媒介传播扩大触达范围，文化适配解决理解障碍，多元主体协同形成传播合力。唯有各维度协同推进，桂林抗战文学的国际传播才能真正实现从“被看见”到“被理解”再到“被共鸣”的跃升。

参考文献

- [1] 吴福辉.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86.
- [2] 黄伟林. 抗战时期旅桂作家的文学创作[J]. 桂学研究, 2015, (00): 84-96.
- [3] 丁英顺. 国际友人在桂林的抗战活动述论[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0, 34(04): 1-5.
- [4] 沈霄, 谢志超. 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国际传播的范式变革与路径创新[J]. 中国编辑, 2025, (12): 78-83.
- [5] 吴银芳. 创新中国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路径[N]. 青海日报, 2026-03-11(007).
- [6] 唐婷.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中国文学外译的困境与策略重构[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02): 173-175.